

从艺术家到高僧

——李叔同弘一大师传论

曹布拉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艺术家到高僧——李叔同弘一大师传论/曹布拉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339-2749-3

I.从… II.曹… III.李叔同一人物研究
IV.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8996 号

责任编辑 沈路纲

封面设计 吴 瑕

从艺术家到高僧——李叔同弘一大师传论

曹布拉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625

插页 1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749-3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 001 第一章 津门少年
- 001 一 由宦而商的父亲
- 008 二 儒释合一的家庭
- 015 三 艺术与西学
- 023 四 国事与家事
-
- 034 第二章 沪上才子
- 034 一 诗酒风流
- 040 二 古砚中的风雅
- 045 三 北征泪墨
- 050 四 南洋公学的新风
- 063 五 名士风流
- 072 六 幸福期的结束
-
- 077 第三章 负笈东瀛
- 077 一 创办音乐杂志
- 084 二 东京美术学校
- 089 三 诗词遣怀
- 093 四 燃放新剧的烽火
- 103 五 忧郁的自画像
-
- 109 第四章 执教武林
- 109 一 短暂而丰富的报社生涯

| | | |
|-----|---|-----------------|
| 117 | 二 | 艺术教师 |
| 122 | 三 | 有后光的人 |
| 129 | 四 | 师生情深 |
| 141 | 五 | 诸艺灿烂 |
| 147 | | 第五章 西湖皈依 |
| 147 | 一 | 断食的体验 |
| 153 | 二 | 告别红尘 |
| 157 | 三 | 出家的原因 |
| 175 | | 第六章 佛门虔修 |
| 175 | 一 | 发愿学律学 |
| 183 | 二 | 墨宝结缘的因缘 |
| 191 | 三 | 掩关修道 |
| 198 | 四 | 云游 |
| 213 | | 第七章 兴律弘法 |
| 213 | 一 | 两法师 |
| 217 | 二 | 用艺术护生 |
| 224 | 三 | 弘扬南山律 |
| 230 | 四 | 以戒为师 |
| 240 | 五 | 救国与念佛 |
| 247 | | 第八章 月圆天心 |
| 247 | 一 | 忏悔 |
| 255 | 二 | 悲欣交集 |
| 262 | 三 | 去去就来 |
| 270 | | 主要参考书目 |

第一章 津门少年

一 由宦而商的父亲



少年李叔同在天津

清光绪六年(1880)农历九月二十日,后来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颇享大名的李叔同,出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庵前陆家胡同的一座大宅院内。李叔同诞生时,其父李世珍(1821—1884),字聘卿号筱楼,时年六十岁^①;生母王氏为李世珍第三个侧室,时年二十。在李叔同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六个姐姐。^②长兄文锦,因病早逝;次兄文熙,字桐冈,号敬甫,长叔同十二岁,擅岐黄之道,三十岁后成为一名医生。李叔同出生后,李世珍购入

① 作者按:本书中述及人物年龄用汉字者,皆为虚岁;述及月日用汉字者皆为农历。

② 高洪钧:《永恒的风景——第二届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从李世珍会试朱卷的发现谈起》言,在天津图书馆藏的李世珍会试朱卷中,李世珍是“道光辛巳年六月初五吉时生”,当生于1821年,纠正了此前大多数著述以为的“1813年”的生年。李世珍有六个女儿的说法也见于高文。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36页。

河东山西会馆南路西大门一处的大宅院，遂举家迁往新居。这所大宅院呈正方形，西东和北南各是十间房的长度，分为四个院，为“田”字形，共有四十多间房。大宅院的中央有一个小花园名“意园”，园内有修竹盆花、山石盆景、金鱼缸、荷花缸、石榴树等。意园旁为“洋书房”，朝东、朝南都有玻璃窗，屋里放置中式木床和书橱，格局颇为讲究，“当时天津一些富贵之家都要有一点洋式建筑，以示文明阔气”^①，李世珍家也不例外。

李叔同幼名文涛，又名成蹊、广侯，字叔同、惜霜、息霜，一生中另有多达数百以至不胜枚举的别号。李叔同的祖籍究为何处，向有天津、山西洪洞、浙江平湖等数种不同的说法。

说李叔同的祖籍是天津的，证据是李家世居天津，李世珍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也明白无误地标明了“直隶天津府天津县附生”，属于天津的考生。

李家后人记起年幼时曾听长辈说过，早年曾有山西人来认宗续谱，说李家的祖上是从山西迁来的。^②这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对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刻在心灵深处一个删除不净的历史记忆。元末明初时，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加以天灾频仍，导致人口锐减。相比之下，山西地区因被元朝统治者视为重要的基地，战事较少波及。据《明实录》记载，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时，山西人口有400多万，比河北、河南两地人口之和还多了30万。明初统治者为了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充实京师，巩固根本，屯垦戍边，加强国防，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多次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据史书记载，明洪武、永乐两朝，政府组织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活动约举行了十八次之多。^③将山西中

① 李端：《漫忆李叔同·家事琐记》，余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300页。

② 李孟娟：《漫忆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俗家》，余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306页。

③ 刘金抗：《山西洪洞大槐树刘氏移民》，<http://www.xici.net/b396942/d34001468.htm>，2006年5月8日。

南部各地的百姓迁往河南、河北、平津、山东、内蒙古、陕西等地。山西百姓在移民前,大多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然后扶老携幼告别故乡,踏上远徙之途。数百年来,这些移民的后裔不断繁衍、不断迁居。据学者研究,现在“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业已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其中河南123个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42个县市,山东109个县市,山西104个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316个县市,陕西、甘肃、宁夏182个县市,黑龙江、吉林、辽宁171个县市,浙江、福建、江西227个县市,广东、广西、贵州248个县市,四川、内蒙古、青海274个县市,云南、西藏、新疆210个县市,海南、台湾111个县市。另外,海外移民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100多个国家。^①因此,将李叔同的祖籍说成“山西”,亦为一个合理的推测。

有意思的是,李叔同本人却多次将自己籍贯说成浙江“当湖”即平湖。^②因此,一些年谱、年表和传记皆持此说。现今浙江平湖市人民政府将李叔同视为平湖人,并在风景秀美的东湖公园里建造起一座美轮美奂的李叔同纪念馆。

传说李叔同诞生时有“异征”:临盆之际,有一只喜鹊衔着一根松枝飞临产房。学者林子青先生否定了这个“异征”的传说,认为“其实并无其事”^③。但“鹊衔松枝”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中云:“始见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小说世界》发

① 刘金抗:《山西洪洞大槐树刘氏移民》,http://www.xici.net/b396942/d34001468.htm,2006年5月8日。

② 李孟娟:《漫忆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中曾认为:“很可能是一九〇二年各省补行庚子(一九〇〇)科考试,我叔祖父李叔同由上海去浙江杭州考秀才时应急填成浙江省的籍贯,以便就近考试。”余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307页。但据现有资料,李叔同十七岁(1896)时以篆书题签《唐静岩司马真迹》时,即署“当湖李成蹊”,之后他多次以“当湖息霜”等署名。

③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页。

表的吕伯攸《记李叔同先生》：“据他（大师）说，这（松枝）便是他当年呱呱坠地的时候，由一只喜鹊衔着飞进来，落在产妇床前的。”后来姜丹书《弘一律师小传》蹈袭此说，说“上人自言，至年长时，此松枝犹保存云”。最荒唐的是《觉有情》杂志当时所引的《晋江通信》说：“法师圆寂时，此木仍挂于禅榻旁之壁上，今存泉州开元寺。”关于此事，圆拙法师曾问过弘一大师圆寂时为其料理后事的妙莲法师。他说挂在禅房壁上的树枝是泉州的龙眼树枝。”故林子青遂认定此因“文人好事，故神其说以惑世人”^①。“鹊衔松枝”之“异征”说，来源于吕、姜二氏的文章，而吕、姜二氏均称出自李叔同本人之口。吕伯攸是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的学生，现代儿童文学家；姜丹书是其浙一师的同事兼好友。以此推测，既存在如林子青所言之姜袭吕说的可能，但也有吕、姜二人各自听到李叔同夫子自道的可能。而且，弘一大师圆寂时壁上所挂的龙眼树枝并不能作为否定吕、姜二人“松枝”的有力证据。“鹊衔松枝”的有无，已无法稽考，留下一个小小的谜——在李叔同一生中此类的谜还有一些，笔者以为是别有意味的，留待后文再论。

李叔同的出生地天津依河近海，地处水陆要津，是首都北京的门户，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1856年到1860年，正当清王朝的军队与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激烈争夺时，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三次进犯天津大沽口。清军爱国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最后还是失败了。1860年10月，侵略者攻入北京，烧杀抢掠，火烧圆明园。同年10月25日，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增开天津为商埠，赔偿巨额军费等。自此，天津开埠。

为了应对天津开埠后的新局面，清政府援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广州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的旧例，最初在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

^① 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1—2页。

臣。后从 1870 年起,以治理“畿辅”的直隶总督兼领北洋通商大臣,一年中,除海河封冰季节仍回省城保定处理公务外,其余时间则分驻天津。北洋大臣不但有权代表朝廷接见各国使节,签订各种条约,而且负责筹建近代国防工业和统帅庞大的新式海陆军,遂使天津成为清王朝的外交中心和推行各种洋务举措的北方中心,造成了天津在近代史上引领近代文明的特殊地位,并促使天津自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到 20 世纪初,出现了一大批近代开新之举。如天津机器局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火药厂;开平矿务局是当时办得最成功的洋务企业,所产煤炭将洋煤挤出天津市场;中国最早的电报和电话通信,最早的邮政和邮票,最早的营运铁路等,无不出于天津。从鸦片战争到 20 世纪 40 年代,先后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在文化方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活跃一时,他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期间,大力宣扬维新思想,使天津成为维新运动的北方舆论中心。1867 年创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是第一所海军军官学校;1885 年创设的天津武备堂,是第一所培育陆军军官的军事院校;1895 年成立的北洋大学堂,其教学体系以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蓝本,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学;天津水师学堂的西乐队,是中国最早的军乐队;等等。^①这众多的近代之“最”,表明了天津人敢于创新和勇于创新的文化心理,与后来李叔同在中国近代文艺领域中创造的一系列率先的“纪录”,应具有一定的联系。

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系同治四年(1865)的进士,曾任吏部主事,后弃官经商,经营盐业,先后创办了“桐达”“桐兴茂”等几家钱铺,人称“桐达李家”,挣下了好大一份家业,是津门有名的富商。据史料记载,李世珍深受儒学影响,好阳明心学,平日的饮食起居,都以《论语·乡党》里孔夫子的言行举止为榜样。晚年潜心向佛,乐善好施,设义塾,与严修之父严仁波合办慈善团体备济社,专事抚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又设贫育所,每到冬季,收养乞丐。故获

^① 罗澍伟:《百年中国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

得“李善人”的美誉。^①李世珍的由官而商,当与彼时社会秩序及社会风气的大变动相关。中国自汉朝以后,士大夫牢牢占据了“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地位,处于四民社会的最高层级。一个人无论是以天下为己任,或仅是为了光宗耀祖,由读书而做官,虽然不是唯一,却是一条由下位向上位攀升的最重要也最安全的通道。明代以后,这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②。到了晚清,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地位相同,甚至还出现了“以商立国”的观点。^③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一败再败,使吞咽着血泪的中国人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这个素以“中央之国”而自豪的泱泱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业已大幅下落,沦为贫穷老迈、任人欺凌的弱国。放眼世界,被资本主义的乳汁喂大的欧美列邦以“船坚炮利”的形象呈现出不可一世的强大。从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以效法西洋为途径,以自强宗旨为号召,谋强求富的声音从民间响到庙堂。曾国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1872)还奋笔致函总理衙门:“窃思铁厂之开,创于少荃(李鸿章);轮船之造,始于季皋(左宗棠);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泰西各国,轮船多而且精固已,日本僻在东隅,新办轮船,闻亦不少,彼岂不惜经费,抑亦谋国者有所不得已也。”(《海防档·福州船厂》)表露其为谋富强而坚持推动工业建设的良苦用心。图强要以求富为先,光绪元

① 胡宅梵:《弘一大师永怀录·记弘一大师之童年》,台北龙树菩萨赠经会,1991年,23页。

② 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序》,许纪霖编,新星出版社,2005年,2页。

③ 王汎森:《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许纪霖编,新星出版社,2005年,111页。

年(1875),薛福成提出:“方今欲图自强,先求自富,自富之道,以矿务为一大宗。”(《三星使书牍》)郑观应提出了更具体的方略:“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盛世危言》)之后,陈虬也设计出详细的求富策略:“富之策十有四:设官钞,定国债,开新埠,垦荒地,兴地利,广商务,迁流民,招华工,汰僧尼,税妓博,搜伏利,汇公产,开鼓铸,权度支。强之策十有六:更服制,简礼节,变营制,扼要塞,开铁路,改炮台,广司官,并督抚,弛女足,求材官,限文童,练僧兵,禁烟酒,限姬妾,优老臣,广外藩。”(《救时要议》)谋求富强遂成朝野上下的共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四民社会秩序开始瓦解,“读书做官”这种传统的上升途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位移,“传统的功名身份甚至官职爵禄已不再是社会唯一的价值指向,失去了固有的吸引力”。^①因此,李世珍的由儒而仕、弃官为商的人生选择,固然有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因素,但拿他与同时代更多仍然浮沉于宦海波涛中的士大夫们相比,不能不承认他既有超前的眼光,又有超前的勇气。

学儒,使李世珍确立了传统儒学的价值观;出仕,让他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人脉,跟朝廷重臣李鸿章、王文韶^②等交好;辞官经商,令他积累了大宗财富,保证一家老小衣食无虞;学儒与信佛,又使他怀抱慈悲之心,在家中营造出一个浓郁的佛教氛围,在外又不时济贫扶弱,得到社会好评;由官而商的人生转向,由儒而释的信仰变换,则在子侄面前树立了一个能审时度势、灵活转换人生航道的榜样。

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李世珍在李叔同四岁那年即患病谢

^①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73页。

^② 王文韶(1830—1908),浙江杭州人。1895年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898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入直军机处;后任体仁阁大学士、政务处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

世,父子相聚的日子并不算长,但李世珍这个亦儒亦释、亦宦亦商的父亲形象及这位父亲在家中构建的浓郁的佛教氛围,并不单单与李叔同的幼年生活发生密切关系,而更将对他的这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①

二 儒释合一的家庭

1884年农历八月初五,李世珍病故。病势沉重的时候,他自知来日无多,命家人请来多位僧人,在病榻前诵读《金刚经》,并不许家人进房来扰乱自己的心绪,他要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全部交托给佛法。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场景:屋中香烟缭绕,气息衰微的老人静卧于床上,床周环绕着一群神情肃穆的僧人。僧人们低眉垂目,或敲木鱼,或数念珠,口中念念有词。而哀容满面的一家老小都挤聚在房门之外,将悲声竭力压缩在咽喉深处。虚龄才五岁的李叔同虽不知父亲行将辞世,但他知道家中发生了大事。他曾扒开人丛钻入房中,掀开父亲病榻的帐帷探视。终于,六十四岁的李世珍在洋洋盈耳的诵经声中停止了呼吸,命终时面容安详。李世珍去世后,灵柩在家中停放了七天。这七天里,每日都有僧人轮班诵经,护送李世珍的灵魂顺利往生西方佛国。这显然给年幼的李叔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致他数十年后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这一幕。孩子是好奇的,年幼的李叔同对于那群给父亲送终的僧人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在之后渐渐长大的日子里,他多次跟他小他九岁的侄儿李麟玉在家里效仿和尚念经做法事。他们把家中的夹被或床罩当做袈裟披在身上,李叔同坐在上首装模作样地扮做大和尚,命李麟玉在下首当小和尚。

^① 胡宅梵《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一文的题记中云:“师(指弘一)曰:‘年幼无知,事不足言,惟我父乐善好施之行,颇堪风世励俗,差足传述。而有余幼年之生活,亦有密切之关系也。’”

父亲去世后,按照惯例,家中居长的男丁二哥李桐冈理应担负起“家长”的责任,成为这个大家庭里的主事者。但其时李桐冈尚为一名年仅十七的少年,家中的大小事务恐怕还得由李世珍的正室姜氏等长辈做主。李世珍共有四房妻妾,依次是大姨太郭氏,二姨太、李桐冈的生母张氏和三姨太、李叔同的生母王氏。据说王氏的“出身很苦”^①,这大概是指她出身贫家,迫于生计才嫁给比她年长四十岁的李世珍,又在二十余岁的年纪便不得不居孀守寡。在旧式大家庭里,年轻的未亡人免不了要受到各种猜忌目光的刺激和风言风语的压迫。人人都认为她在丈夫去世后应心如止水,不能多说一句话,不能走错一步路,高兴时不能大笑,悲伤时亦不能大哭,如同木偶一般才符合“节妇”的“妇德”。种种有形无形的规矩如一条条绳索,不仅捆住了她的手足,也缚住了她的心灵。后来,李叔同跟人感慨说:“我的生母很苦!”这应当主要指她在精神上所受的重压与重创,而非物质生活的匮乏——年幼的李叔同大概很少见到寡母脸上展现过笑容。

对于一位年轻而不得不“守节”的寡妇而言,王氏所有的希望就在于膝下这个儿子。把儿子培育成人,成为她生活的唯一目标和全部意义。没有资料表明王氏读过书,旧时代的妇女要“从夫从子”,只是男人世界的附庸,活动在极其狭小的圈子里。丈夫去世后,王氏就加倍精心地培育自己的儿子。她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严母。她的目光终日投射在儿子身上,对儿子的一举一动都明察秋毫,她要求儿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言行举止,都得像父亲李世珍那样符合《论语·乡党》所列的各种君子范式,若儿子稍有逾矩之处,母亲便不厌其烦地加以纠正。尽管这些繁琐的规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未免太严格了一些,但从中也折射出一个母亲望子成龙的殷殷之心。

在李叔同七岁那年,二哥李桐冈担任了他的启蒙老师。十九

^① 李孟娟:《漫忆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俗家》,余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306页。

岁的二哥教他识字,阅读《玉历钞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等一类彼时流行的启蒙读物。李叔同九岁时,又从常云庄先生受业,读《孝经》《毛诗》《千家诗》《唐诗》;十岁读《四书》《古文观止》;十三岁读《尔雅》《说文解字》,并开始临摹篆帖和学习篆刻。

从李叔同童年到少年这一时期所读的主要书目来看,他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学教育。从汉代始,儒学及儒家文化所包含的道德精神一直是中国传统读书人赖以立身处世的精神支柱。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中国文化精神的指向,主要在成就道德而不在知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也是在行为而不在知识。换言之,中国人读书,不是为了知识;知识也不是衡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尺度,这在二千年的历史中是表现得很明白的。”^①尽管此时世事渐变,风气渐开,但历史的车轮仍在原有的轨道上做惯性滚动。大门外高悬着“进士第”匾额的桐达李家,在处事灵活的李世珍故世后,对子弟的启蒙教育还不可能偏离传统的框架。幼年时接受的儒家道德教育,对李叔同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李叔同是个早慧的孩子,他七岁时就能相当流畅地朗诵收入《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古代散文名篇。当他站在母亲的跟前,用清亮的童声朗读文章时,那琅琅的读书声,在母亲耳中多半如同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据李叔同本人后来的回忆,在父亲去世后,家中仍经常请僧人来念经、拜忏^②,使他经常近距离地观察僧尼这些职业宗教徒的行为举止。有一位王孝廉是虔诚的佛教徒,曾至普陀山出家,后返居天津的无量庵。李叔同有一个早寡的大侄媳,经常向王孝廉请教《大悲咒》《往生咒》一类的经文,李叔同在一旁听了几遍,就能流利地背诵。他在十二三岁时,还曾学僧人“放焰口”——佛教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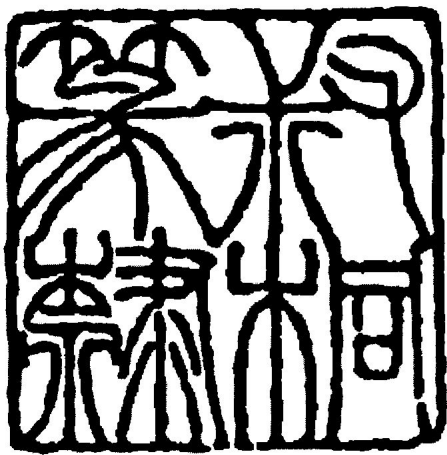
① 徐复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命运》,许纪霖编,新星出版社,2005年,63页。

② 弘一口述、高文显记录:《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种仪式——当然,这种对佛教仪轨的学习,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那里,更多还是出于一种游戏的心态。但无可否认,在李叔同的童年至少年的岁月里,一方面,他循序渐进地接受着儒学的课程教育,学习去做一个熟读儒学经典又兼擅诗书琴画诸般艺事的传统读书人;另一方面,他又能在家中时时看到壁上的佛像,听到不绝于耳的诵经声,而且常常被大人领去跟来家里做法事的僧人们见面行礼,被浓郁的佛教气息包围着。易言之,李叔同最早、最经常接触的,是儒学和佛学这两种文化。后世远离各种宗教的无神论者们,对于宗教和宗教徒,或多或少会怀有一种莫名的神秘感和隔膜感,但对于生活在19世纪末天津那个大家庭中的李叔同来说,宗教——尤其是佛教,不仅是他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是他生活的组成部分。

心理学认为,童年记忆、童年生活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养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一个人成年后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人生选择及性格特点等,往往能在他的童年经历中找到相应的依据。童年时期的各种经历,各种见闻,某种兴趣的萌发,某种才能的展露等,也许都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但这些不经意的、无意识的经历见闻,就像一颗颗种子似的,已经悄悄地钻入他心田的深处。

要让一个孩子日复一日地面对枯燥的儒学经典而不厌倦,同时给他以形象和情感为特征的艺术来作为调剂,恐怕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办法了——可以说,任何一个儿童都是天生的音乐家和画家。前文述及李叔同七岁时爱在母亲跟前背诵《昭明文选》中的散文而非“子曰诗云”,显然也因为古代散文本身就蕴涵着美的形象和节奏,这种美的熏陶如春雨般润物无声,却又效力巨大。很自然地,在读书之余李叔同逐渐喜欢上了金石书画、诗词曲赋这类传统艺术。中国古典艺术里,都包含着美的丰富因子,无论是儒家推崇的“文质彬彬”的中和之美,还是释道两家倡导的“清静”“自然”的空灵飘逸之美,都浸透在诗词曲赋、金石书画中,向接受者发送美的气息,滋养着接受者的审美能力。在同一个文化体系框架内会培植出相似的旨趣。千百年来,传统教育体制曾培育出一代代兼



李叔同的篆刻

擅艺术的士大夫,造就了
中国文人对诗、书、画、乐
等的共同兴趣。李叔同很
容易在家境相似的同龄
人中间,找到一群旨趣相
投的朋友,时时跟他们交
流切磋。除此之外,他还
向津门一些雅好艺事的前
辈名士如赵幼梅、唐敬
严等讨教请益。而前辈们
也乐于向这位聪慧好学的
少年传道授艺,与他一

起探讨艺术的奥秘,分享艺术的精神佳肴。在那个世事剧变、国运危艰的时代里,老少之间得能暂时避开世事的困扰,进行这种艺术性的对话和交流,肯定是一件让彼此都感到身心愉悦的事。特别是前辈们看到这位少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出色的艺术把握能力在日新月异地进步着,多半会备感欣慰,劝勉有加。

1896年,李叔同十七岁时,曾请唐敬严先生用钟鼎、篆、隶各种字体书写了一部书法集。李叔同出资为之编辑刊印,书名题为《唐静岩司马真迹》,署名“当湖李成蹊”。这是目前所见李叔同最早以“当湖”(浙江平湖)为籍贯的记载,这里面蕴涵着一种叛逆的信息。有学者认为,李叔同的母亲王氏籍贯是浙江平湖。^①

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少年,多半也拥有一颗自尊的、敏感的心灵,而青春期自我意识的萌发,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外化为类似于愤世嫉俗的逆反情态,变得不像小时候那般乖巧,以致在老成练达的成年人看起来,这个少年颀头倔脑,身上带有某种偏激的“叛逆

^① 陈宰:《李叔同——弘一法师,兼考“家在萧山潘水间”》,载政协平湖市委员会《文史通讯》,2004年第2期。

精神”，行为也显得执拗怪僻。而在少年这一方，随着年齿渐长，读书渐多，对所见所闻的各种事物，都想要作出自己的评判，以表明自身的独立存在。自我意识的树立，必然对自尊有着强烈的敏感。于是，朝夕相处的二哥李桐冈在李叔同的眼中便日益显出种种世俗的缺点来。李桐冈是一名医生，其职业身份注定他要天天面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形形色色的患者及家属；他还是这个大家庭的长男，要料理李家名下的各处产业，这又注定他应具有计算利害的头脑和灵活的交际手腕。据李家的后人回忆，李桐冈对家中子弟的管教相当严格。^①已萌发了独立意识的李叔同显然不愿接受二哥对自己的种种管束。于是，在弟弟李叔同看来，二哥李桐冈的有些行为是令人看不惯的，尤其是他在待人接物时，“其礼貌辄随人之贵贱而异”^②，是很不应该的。由于兄弟二人相差十多岁所形成的“代沟”，各人的性情与爱好也大不相同，按照儒家的伦理规范，居长的哥哥固然要友于弟弟，居下的弟弟也应敬爱哥哥，而且长兄若父，更值得敬畏。这就使李叔同对哥哥某些做法的不满，只能以一种曲折隐晦的形式表露出来。李叔同平日喜欢养猫，这时他故意“敬猫如敬人，见人反不致敬”^③，这种怪异的行为和犟头倔脑的表现，在不知究竟的人看来，就会觉得这个少年性情怪戾，不近人情。

平等思想在少年李叔同头脑中滋生，应与他庶出的身份相关。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体系，尊卑高低不容混淆，家庭中也有着上下有序、等差分明的伦理规则。李叔同母子的地位在这个家庭里位居末次，乃由他们的身份所决定的。我们只要看一看《红楼梦》里贾环母子在大观园里的屈辱地位，就可以想见李叔同

① 李端：《漫忆李叔同·家庭琐事》云：“二伯父（指李桐冈）治家甚严，从他对我四哥的管教上可以看出来。……”余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295页。

② 胡宅梵：《弘一大师永怀录·记弘一大师之童年》，台北龙树菩萨赠经会，1991年，23页。

③ 出处同上。